

寺洼遗址与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

施劲松

2025 年 4 月，甘肃临洮寺洼遗址入选 2024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寺洼遗址发现于 1924 年，1945 年夏鼐曾在此进行过考古发掘。2018 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遗址进行发掘，至今取得了重要收获。新的发现包括马家窑文化的大型聚落和寺洼文化的大型墓地。马家窑文化聚落总面积超过百万平方米，聚落里有距今约 5000 年的长方形布局的三重围墙，围墙内为制陶区和石器生产作坊，还有半山类型的房址、灰坑、窖穴和墓葬。这是目前已知的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的马家窑文化聚落遗址，对于我们认识黄河上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至关重要。

寺洼遗址地处洮河流域，在洮河沿岸还分布有马家窑、阳洼湾、林家、齐家坪等著名的史前遗址，这让洮河不只是地理上的一条黄河支流，而是赋予这个流域在中国考古学史和中国古代文明史上非同寻常的地位。

洮河流域是我国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区域，至今已有百年历史。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洮河沿岸先后发现了马家窑、半山、齐家坪、辛店、寺洼等遗址。此后考古学家认识到洮河流域是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最重要的分布区，并确立了洮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洮河流域以及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事关中国文化起源和古代世界的文明图景等重大问题。1924 年安特生发现马家窑和齐家坪等遗址后，将马家窑遗址定为仰韶期，年代晚于齐家期，并认为马家窑的彩陶与中亚的彩陶很相近，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安特生在洮河流域的考古工作具有开创性，但他的遗址分期和对中国文化起源的认识是错误的。30 年代尹达认为安特生的分期有错，40 年代裴文中、夏鼐等在甘肃开展田野工作，指出了同样的问题。1945 年夏鼐在广河阳洼湾发掘，证明齐家期晚于仰韶期，1949 年又提出马家窑文化的命名，从而纠正了安特生的认识。从此以后，中国文化独立起源成为我们认识和研

究中国史前文化的根本立场。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随着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大量发现，学术界对于中国史前文化起源的格局先后形成了东西二元对立说和中原中心说。1977 年，夏鼐根据碳十四测年揭示出的包括甘青在内的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提出需要重新考虑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问题，认为不同区域的文化有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这突破了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于中原并向四周传播的认识。80 年代，苏秉琦将中国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遗存分为六个区系，指出同一时期内各地的文化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发展，并与中原相互影响。张光直提出公元前 4000 年以后，中国各地文化相互交流，形成了一个史前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严文明提出中国史前文化形成的格局就像重瓣花朵，花心是中原，周围的其他文化区如同花瓣。对于以上有关中国史前文化起源和形成格局的认识，包括洮河流域在内的甘青地区的古代遗存发挥了重要作用。甘青文化区是中国史前文化花朵的一个花瓣。在洮河流域孕育、产生的马家窑和齐家等考古学文化留下了众多的遗址，还有大量体现文明成就的彩陶、玉器、早期铜器。甘肃的彩陶从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开始延续到青铜时代，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发展到高峰。齐家文化成规模生产的玉器和早期铜器，显示出当地文化和社会发展程度，对探究中国青铜时代的开端不可或缺。这些遗存的重要性突破了甘青，或者西北这样的地域限制，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史前文化具有全局性的意义。甘青还是文化交流的通道，史前的物品、

资源、技术、观念都经此传播。大约在距今五六千年前，仰韶文化向西发展，至马家窑文化时农业发展、彩陶开始专业化生产，马家窑文化又进一步影响到了川西高原等其他地区。那时，中国北方、中亚、黑海之滨等广泛分布的彩陶文化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欧亚大陆这一时期的文化景观。在距今 4000 年前，冶金术、牛、羊、小麦经由西向东传播，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铜刀，就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制品。齐家文化汇聚了早期铜器、玉器和家养动植物，显现出广阔时空背景下的区域沟通和文化融合。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由此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

如今，站在洮河边的高地上，河谷一览无余，黄色的河水在宽阔的谷地中蜿蜒流淌，不同时代的遗址分布在两岸高低不同的台地上，构成一幅远古时代的图景。在刘家峡附近，洮河与黄河交汇，宛如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汇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大河之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寺洼遗址及周边地貌(上为西南)

寻迹宜兴“许馊”墓

何文竞 孙振

1987 年 5 月，在宜兴县宜城镇南门外土山墩，宁杭公路东侧 50 米县经济协作委员会职工宿舍基建工地（体育场南河沿）发现了一座大型砖室墓，经报告无锡市文管会后，无锡博物馆参加了随后的墓葬清理工作。此墓造型雄伟、规模庞大，是宜兴乃至无锡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占地面积最大的砖室墓之一，特别是石门上的阴刻“朱雀铺首”画像，非常精美，为南方地区画像石艺术的杰作。惜该墓被一座六朝墓打破，早年已被严重盗扰。加之 20 世纪 60 年代附近生产队为砌集体猪舍，该墓墓砖大部分被挖走建猪舍。至 20 世纪 80 年代清理发掘时，墓葬基本只剩大致轮廓和少量墓砖以及个别文物了。因上述原因该墓资料一直没有正式发表。学术界对该墓情况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宜兴曾发现过这样一座大型砖室墓。

笔者最近无意中在无锡市文管会公文档案资料中发现了当年该墓发掘情况和墓葬形制的一些文字资料，又在《宜兴县志》《中国文物地图集》《无锡文博》，宜兴市考古和文物保护中心、宜兴市博物馆等处找到有关该墓的零星资料，大体可以复原出该墓的基本信息。现将收集的这些资料归纳整理，希望能为相关研究学者提供一些线索。本文对墓葬的介绍多引用自无锡市文管会保存下来的公文档案资料，不再另注出处。

墓葬形制

墓葬为南北向，墓门朝北，墓室主体由前室与后室构成，前室两侧各有一侧室，侧室门朝南。前、后室以过道相通。墓葬全长 15.44、宽 8.45 米。甬道至残壁长 7 米，甬道口两侧翼墙总长 8.32 米，墙宽 0.66 米，墙东西两端向北延长达 9 米多，形成了一个达 80 平方米的大厅，大厅底部铺五层砖，一层平铺，一层五块侧铺拼成，最上一层平砌与墓室甬道砖平。墓室铺地砖下正中有一条长 20 多米的排水沟，成两条小沟向外排水。因为没有墓室各部分的准确数据和全景照片，我们目前无法复原其精确的平剖面图，但根据整理出来的墓葬描述可知墓葬平面结构应该与洛阳烧沟汉墓的“第二型”中带双耳室墓、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安徽马鞍山宋山墓的结构相似。其中马鞍山宋山墓有两道石门，



“许馊”墓出土三足陶盆（宜兴市博物馆藏）

墓葬结构与该墓最为相似。

甬道口前面有石台、石凳、祭案。这样的组合形式在苏州虎丘路新村 M1 和苏州虎丘黑松林 97M4 中都曾见到过。甬道石门上阴刻朱雀纹，石刻图案与安徽亳州董园村 2 号东汉晚期墓门额上双凤凰图极为相似。

墓室地面原铺几何印纹和麻布纹楔形砖，正反面均有“大吉五铢”铭文五枚，每枚五铢外缘有直射线纹。砖长 45、一头宽 21、另一头宽 16.5、厚 9 厘米。墓室砖为绳纹，未发现铭文，砖长 42、宽 21、厚 9 厘米。纹饰相似的砖在浙江湖州窑墩头东汉三国墓中也曾见过。

出土文物

画像石 门 高 120、宽 58、厚 9 厘米，石门上下各阴刻朱雀三只，石门柱石阴刻菱形花纹，石门楣石上阴刻有似白虎和朱雀。从宜兴市博物馆通史馆展陈拓片资料来看，保存下来的石门有两扇，均为阴刻朱雀铺首纹，其中一件保存较好，朱雀纹比较清晰，铺首下部风化比较严重。两侧饰多层菱形纹，另一扇风化严重，但尚可识别朱雀纹的大致轮廓，两扇门为一对。

陶三足盆 1 件。敞口、小平沿、方唇，口至颈部饰三道凸弦纹。下腹部亦饰三道凸弦纹，腹部弦纹处均匀刻印三个铺首，斜腹内收，平底，底部周边有三个马蹄

形足，高 12.4、腹径 31.8 厘米。

铜盖弓帽 2 件，情况不明，无锡市文管会公文档案记录“铜质车饰 2 件”。

漆皮 红色，具体情况不明。

石案、石榻 具体情况不明。

墓葬年代及墓主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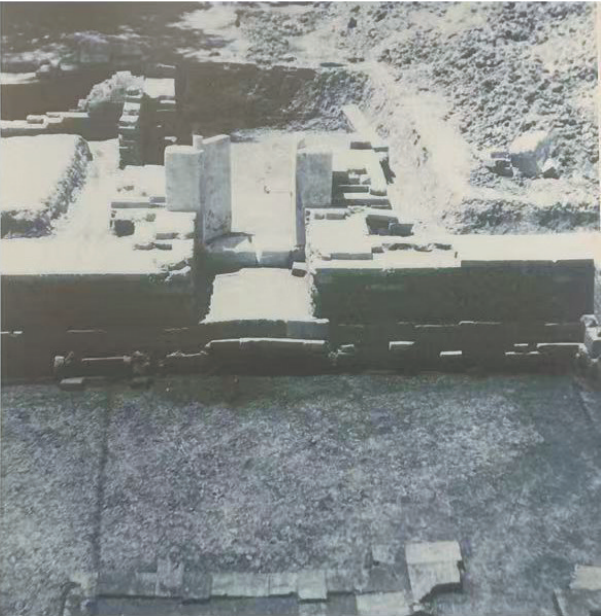
虽然该墓破坏严重，但根据留下的资料，还是可以推断出墓葬的年代。例如前、后砖室且前室带两个侧室的墓葬形式主要流行于东汉至三国时期。该墓出土的三足盆与朱然墓出土的“铜炭炉”如出一辙；与江西南昌东吴高荣墓所见铜炉也非常相似。石门上朱雀铺首流行于东汉画像石墓墓门装饰，只是目前所见的朱雀铺首纹多为浅浮雕，这可能与地域差异有关，苏州东汉、三国墓即发现过数处阴刻线画像石。石门上朱雀纹下方的铺首纹虽已漫漶不清，但铺首头顶角的轮廓线比较清楚，与浙江德清凤凰山 M2 画像石门相似。墓门外围两侧边饰为多层菱形纹，与建宁四年宴乐、纺织画像下侧边饰相似。上部边饰为收起的帷幔纹，与虎丘黑松林 M4 所见石屏上端纹饰一致。据此可以知道该墓的年代应为汉末至三国时期。

与该墓结构相似的宋山墓砖室部分长 17.68、宽 6.6 米，其体量与该墓大体相当；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长 14.5、宽 5.68 米，比该墓略小。孙吴时期墓主身份明确的张昭墓、朱然墓、丁奉墓体量则要小很多。一般认为宋山墓和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墓主为孙吴重要宗室成员。如果该墓为三国时期墓葬，墓主身份应该不低于宋山墓和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墓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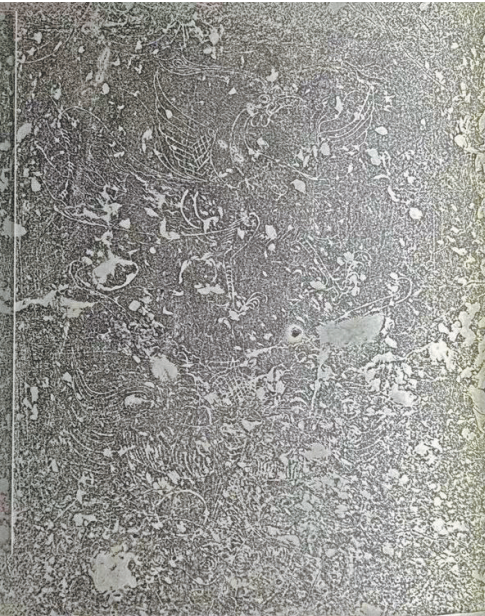
若该墓属于汉末，大致同时期的安徽亳州曹操宗族墓中元宝坑一号墓，内长 13.12、宽 8.72 米；董园一号墓，内长 13、宽 10.4 米；董园二号墓，内长 15.3、宽 10.2 米。墓葬体量与该墓相当或略大。

据《新修宜兴县志》第八卷孝友部分记载，（宜兴县）南门外有许将军墓，因此墓主可能为汉灵帝时位至太尉许馊。从墓葬形制特点、出土遗物等多方面来看，许馊身份和时代均较符合，确是墓主的“最佳人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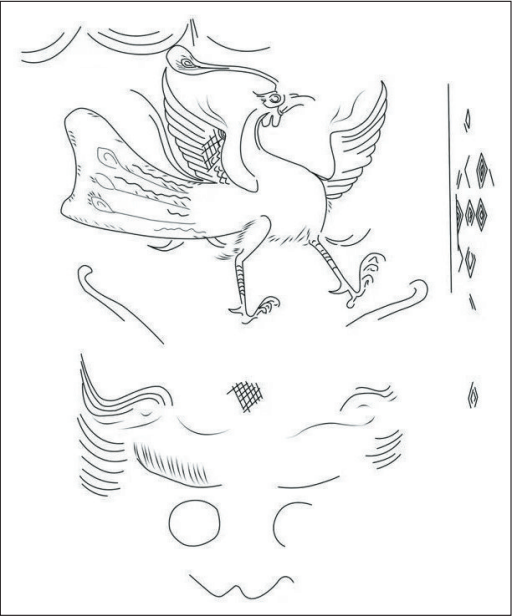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宜兴市考古和文物保护中心）



“许馊”墓发掘照片（宜兴市博物馆藏）



“许馊”墓石门画像拓片（宜兴市博物馆藏）



“许馊”墓石门画像摹本

『四化』与新石器时代中国中东部地区陶器种类趋同发展

陈伟驹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生态环境，因而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因此，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划分出多个文化区。不同文化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多元起源、并列发展、交流融合，形成多元一体格局。这基本已是学界共识。在“多元起源”与“交流融合”中包含了一种现象，即特定文化因素在一个地区的出现明显早于其他地区，经过长时间的扩散后，其分布范围渐次增大。这种现象在中国考古学语境中常常被称为“化”，比如“龙山化”“大汶口化”和“崧泽化”等。以往的学者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往往局限于一个时段或一个区域。实际上，这种现象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波及大半个中国。下面以中国中东部地区为例（包括黄河下游、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拟提炼“四化”，以此论述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种类趋同发展现象。

第一个是距今约 8000—7500 年的“上山—跨湖桥化”，标志性陶器是圈足盘和盘口釜。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主体年代落在距今 9500—8500 年间。这一文化从早期开始，便已出现圈足盘，中晚期愈加发达；迟至晚期出现盘口罐或釜（或称宽凹沿釜）。这两类器物在距今约 8300—7000 年的跨湖桥文化中被继承并发扬光大，其中圈足盘中还分化出一种细柄、高圈足的豆。而在距今 9000/8600—8000/7800 年间长江中游彭头山文化、淮河上游贾湖一期文化和淮河中下游顺山集文化中，未见圈足盘，釜为无沿或外卷沿，基本不见盘口者。但同样在以上地区后继的（距今约 8000/7800—7500 年）城背溪文化晚期、皂市下层文化初期或称彭头山—皂市下层过渡期、裴李岗文化和顺山集三期文化中，另外还包括长江中下游交界的江西靖安老虎墩一期遗存，都出现明确的圈足盘和盘口釜。无论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传播，甚或是相似的功能化演进，其“策源地”无疑在长江下游。虽然与这些文化同时的是跨湖桥文化，但圈足盘和盘口釜这两个文化因素根源在上山文化，因而本文称为“上山—跨湖桥化”。

第二个是距今 7500—6000 年的“裴李岗—双墩化”，标志性陶器无疑为鼎。淮河上游的裴李岗文化主体年代为距今 8000—7500 年或略晚。这一文化的鼎已经很成熟了。而同时期的黄河下游后李文化、淮河中下游小山口一期文化与顺山集三期文化、长江中游彭头山—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基本不见鼎或受裴李岗文化直接影响出现极个别鼎。但是在距今 7500—6000 年间，黄河下游及淮河中下游的北辛文化、双墩文化、青莲岗文化、环太湖地区骆驼墩文化与马家浜文化、长江中游下王岗一期文化和边畈文化，都开始普及鼎。其中，以双墩文化为中转站，整个东部地区北辛、青莲岗、骆驼墩与马家浜诸文化由前一个阶段的釜文化转变为鼎文化的现象，波及范围最大，最引人注目（潘璐瑛：《双墩文化陶鼎的兴起、扩散及影响》，《考古》2024 年第 10 期）。为了强调这一阶段双墩文化的作用，同时也突出裴李岗文化作为鼎的源头，这里提出“裴李岗—双墩化”的概念。当然，长江中游地区鼎的出现，应不是双墩文化中转的结果，而是豫西南地区裴李岗文化经大张庄遗存的过渡阶段传播的结果（袁广阔、宋瑞：《论中原裴李岗文化对长江中游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影响》，《江汉考古》2024 年第 6 期）。这一结果似乎可划入“裴李岗—双墩化”中的“裴李岗化”。

第三个是距今 6300/6000—5300 年的“马家浜—崧泽化”，标志器物是豆与觚或杯，可能还包括带把手的实足鬲与盂。前述长江下游跨湖桥文化率先出现明显高圈足、成熟的豆，但是在距今 8000—6300 年间，除了邻近淮河中游双墩文化出现很少量的矮体喇叭足豆外，其他地区基本不见豆。距今约 7000—5800 年的马家浜文化的豆继承于跨湖桥文化，并且在陶器组合和社会中的地位更高，远超跨湖桥文化。比如，陶豆在跨湖桥文化陶器总数中，占比不到 2%；到了马家浜和骆驼墩文化中，陶豆占陶器总数基本都在 5% 以上，多数为 10% 以上。其次，陶豆在这一时期马家浜和骆驼墩文化中，成为随葬品中最常见的器类，比如马家浜遗址，只要有随葬品的墓葬，绝大多数都有一件豆。形态规整的觚或觚形杯、实足鬲和盂等器物，基本也是最早出现于马家浜及骆驼墩文化（觚可能晚至崧泽文化初期），而且数量众多，作为策源地证据充分。而同时期黄河下游和淮河中下游地区的北辛文化、双墩文化、长江中游汤家岗文化（早中期）、边畈文化、柳林溪文化基本不见上述器类。而在距今 6300/6000—5300 年之间，上述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侯家寨文化、黄鳞嘴文化、薛家岗文化、龙虬庄文化、油子岭文化、汤家岗文化末期—大溪文化，普遍开始流行豆、觚形杯，而鲁皖苏浙所在的东部地区还常常见到实足鬲与盂。实际上，除了陶器外，这一阶段上述地区开始出现的玉璜和玉石钺，也多可以追溯到环太湖及其邻近地区。把整个马家浜文化阶段囊括进来，我们发现这一“化”比以往学者观察到的“崧泽化”现象范围要更大，因而改成“马家浜—崧泽化”。这次文化传播现象范围之大，内容之多，远超上一阶段，真正使得整个中国中东部地区文化大幅度趋同。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除了中东部地区的“马家浜—崧泽化”外，整个黄土高原及其邻近地区，也在经历“半坡—庙底沟化”，但是其重点是彩陶，突出器类是罐、盆与钵，与中东部地区的豆、杯或鬲、盂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多平底，结构相对简单，后者则多是圈足、三足、有把手、有管状流，早有学者指出，背后可能暗示两大文化系统的思想差异（吉德炜：《考古学 with 思想状态——中国的创建》，陈星灿译、曹兵武校，《华夏考古》1993 年第 1 期）。

第四个是距今 4800—3800 年的“大汶口—龙山化”，标志性器物空三足鬲，可能还有大口尊或缸等。“龙山化”的概念最早由张光直先生提出，近年来张弛指出，不少文化传播现象在大汶口文化阶段已经开启，“龙山化”是“大汶口化”的结果（张弛：《龙山化、龙山时期与龙山时代——重读〈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南方文物》2021 年第 1 期）。笔者深以为然，并借此提出“大汶口—龙山化”的概念。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对整个中国中东部地区的影响，学者多有论及。将同一文化系统的两个文化视为一大阶段，可以将海岱地区对周边地区的新次影响看得更清楚。由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影响，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张四墩遗存和北阴阳营 H2 遗存、良渚文化晚期和钱山漾文化普遍出现空三足鬲（一说良渚文化空三足鬲独立起源），而且都是一种细长颈的鬲；部分文化还出现带有大汶口文化特有符号的大口尊或缸。龙山文化时期，以大汶口文化在鲁豫皖交界地区的后继者造律台或王油坊文化（一说是龙山文化地方类型）为中介，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对长江中下游乃至淮河上游的中原地区（如王湾三期文化）影响持续加强，这些地区的鬲演变为龙山时期特有的大口鬲，而对江淮地区南谯遗存和环太湖地区广富林文化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单一的器物，后者的整个文化面貌都与龙山—造律台文化趋同。这一波文化扩散影响范围实际上还不仅仅局限于中东部地区，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在空三足鬲的影响下，依次出现空三足鬲、鬲和甗，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带有圈足和把手等功能附件。这似乎反映，东部地区的思想也开始影响西部地区。

经过以上“四化”后，中国中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各文化区虽然陶器组合和特征仍然有异，各自属于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但基本都拥有了鼎（釜被替代，但盘口被保留）、圈足盘、豆、鬲和觚（杯）等器类。这些器类被青铜时代二里头文化继承了下来，成为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通过二里头文化强有力的辐射影响，又进一步波及辽西和长江上游。可以说，二里头文明就是中国中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四化”开出的最灿烂的果实，它开启了辉煌灿烂、影响深远的夏商周三代文明。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